

高校吸引社会捐赠不能只靠富豪校友

刘 洋

5月20日是浙江大学120周年的校庆日,这一天浙大接受了一家校友企业11亿元的捐款,造就了中国高校史上单笔最大捐款。一时之间,高校捐款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高校捐款谁来捐,如何捐?对于我国社会及高校自身来说,捐赠仍属新鲜事,目前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2015年,财政部、教育部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的通知》,提出要引导和激励中央高校吸引社会捐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也指出,要把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并且给予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包括自主确定收入分配,自主使用学校财产和经费。这些相关政策的颁布,正显示出社会捐赠制度建设背后的深层次诉求乃是高校体制的转型与变革。

社会捐赠的意义不应只是聚焦在资金数额大小上,被高额的单笔捐款吸引眼球,反而会误导公众对于高校捐赠的认知。从高度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向国家财政拨款、学费、社会服务费、校办产业收入及社会捐赠等多方面收入转变,高校改革中的软硬件相互联动,需要的是高校自身拿出过硬的决心和更具操作性的实施计划,而非集中在校庆的时候搞几个富豪校友拿几笔巨款“充充门面”,在平时却依赖财政拨款,仍停留在“等、靠、要”的老观念中。

据统计,国内2000多所高校中,有426家成立了教育基金会,设置了专门的捐赠和校友工作部门。但在基层部门中,相关工作的开展力度却远远不够,这就使得吸收捐赠的途径方式单一,募款对象仅限于少数富豪校友,个人和组织参与度与积极性低,高校自身又缺乏完善的捐赠体系约束捐赠资金的管理使用。多种原因之下,高校捐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些重点大学的“精英们的游戏”,而为数众多的普通大学乏人问津,普通校友也极少参与其中。

高校捐赠为什么做得不好,做得不够?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高校行政化管理,使得高校不用“吃捐款饭”,高校也就缺乏相应动力。据了解,在美国,校友对母校的捐赠是仅次于基金的第二大捐赠收入来源;其中来自个人的捐赠约占全部捐赠基金的44%,形成了高校捐赠基金的第一大来源。所以,高校必须建立和维护好与校友、非校友个人、基金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才能够获得来自社会的捐赠基金。

而在目前高校改革的形势下,我国高校既需要实现收入方式的转变,就应该在学校开源和融资方面下更多功夫,设置开源团队扩大学校收入来源,行政管理和 service 团队配置好各方面资源,为教学、科研、学生提供更多服务;教师和研究人员则专注于高校核心功能,保证教学,提高科研能力。各板块各司其职,并有机互动,使学校既非被利益捆绑,又能保证其社会效益的发展方向,从而带动高校制度改革的实质性进展。

此外,高校捐赠不能仅仅依赖富豪,而应该重视普通校友的捐赠。数据显示,与国外知名高校普通校友捐赠占大头相比,我国高校的校友捐赠比例仅在1%~2%,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令人深思。事实上,薪火相传作为一种价值引导,并非干巴巴的传统观念,同时也是知识传承中带有人情味儿的经验传递。轰动一时的张磊捐助耶鲁大学的事件中,张磊表示对耶鲁大学曾在其创业之初对他进行资金资助饱含感恩之情,而这也可看作是学校感恩文化中的一种具体交流。

笔者曾在自己母校的网站上查询过自己的就读信息,却一无所获,然而官网头栏却不间断动着学校里毕业的明星校友,这种情况并非个例。试问,如果在高校就读多年,却毫无“存在感”,只做技能培训,却并无情感维系,学校遇上校庆等大事,想到的也只是知名校友,一名普通校友又如何会自发向学校捐款呢?或许,作为一种情感纽带,高校捐赠也为高校文化的培育敲响了一记警钟。

县域义务教育督导办法出台

小学、初中班级学生数分别不超过45人、50人

本报讯 (记者于忠宁)教育部日前印发《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5月23日,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局长何秀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评估过程中如果存在以考试方式招生、违规择校、设重点学校或重点班等问题,将实行一票否决。针对大班额问题,要求小学、初中所有班级学生数分别不超过45人、5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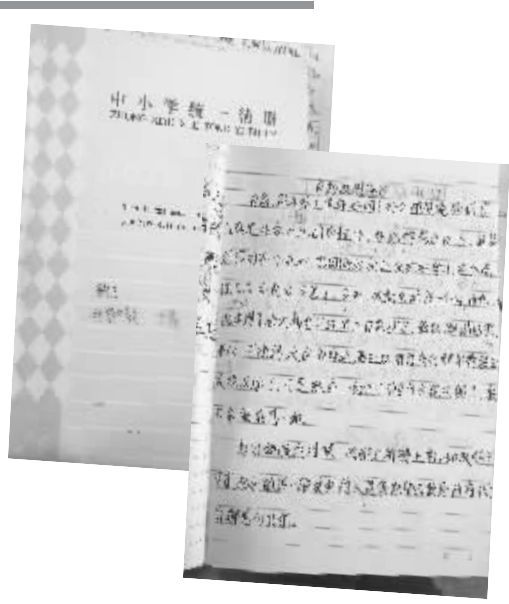
《办法》提出: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的对象是县(含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和国家划定的其他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单位)。

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已有1824个县(市、区)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国家认定,今年,预计还将有500个左右的县(市、区)接受认定,届时合计总数将达到2300个左右,占全国总数近80%。巩固基本均衡发展成果,实现优质均衡发展,已经成为这些地区义务教育新的紧迫任务。

何秀超表示,在政府保障程度评估方面,将通过15项指标重点评估县级人民政府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工作成效。具体包括:所有小学、初中规模不超过2000人,九年一贯制学校、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义务教育阶段规模不超过2500人;小学、初中所有班级学生数分别不超过45人、50人。

此外在资源配置评估方面,《办法》明确将通过生均教师数量、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等7项指标,重点评估县域义务教育学校在教师、校舍、仪器设备等方面的配置水平,同时评估这些指标的校际均衡情况。

《办法》明确,将以考试方式招生、违规择校、重点校、重点班、“有编不补”或长期聘用编外教师、弄虚作假、教育系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严重违纪违法事件等情况,以及社会认可度作为一票否决指标。



本报记者 曲欣悦 贺少成

从安徽省合肥市市区驱车一个小时就能到达寿县刘岗镇。刘岗镇上仅有的两所初中都是寄宿制,刘岗中学就是其中之一。学校目前有210名学生,学生住校的比例达到80%以上。

除了寄宿制,刘岗中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留守儿童孩子多。在张庆敏老师所带的七年级(1)班,一共43名学生,其中有9名孩子的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13名孩子的父母中有一方在外务工,留守儿童比例超过一半。

这些孩子已不习惯与父母交流,也不会轻易向老师吐露心事。只有在日记或老师布置的周记中,他们才会解锁内心深处的自己。思念、埋怨、不解、心疼、疏远……本不是这个年纪该有的情绪,成了孩子们身上不可触碰的“痛点”。

父母会在他们睡着时离开,几乎成了孩子们最熟悉的“套路”

“妈妈回来了,我终于把忍了几个月的思念全都释放了。可是到了第二天,妈妈厂里的老板打电话叫妈妈回去了,妈妈乘上客车,是在我和妹妹不知情的情况下走的……”

——摘自留守儿童日记

胡升今年13岁,是七(1)班22名留守儿童中留守时间最短的。今年过完年后,他的妈妈选择去合肥打工。只不过,妈妈是选在晚上等他们睡着后偷偷走掉的。

“第二天早上起来后,爸爸告诉我们妈妈走了。我和妹妹当时都非常难过。妹妹哭了一天。”

胡升和妹妹再次见到妈妈,是在三个多月之后。“我和妹妹从爸爸那儿听说了妈妈要回来的消息,都非常激动,一路奔向马路边,等待着妈妈,妈妈也给我们带了好多好多零食。”胡升在日记里,描述了妈妈回来时的场景。

“妈妈回来的时候,家里人都流了眼泪,非常高兴。妹妹一上去就抱住妈妈不放。妈妈当时也哭了。”胡升告诉记者。

然而,妈妈到家的第二天就接到了厂里老板的电话。胡升听到妈妈对着电话接连回答:“好的,好的。”他觉得不妙,赶忙过去问妈妈:“能不能不走?能不能多呆几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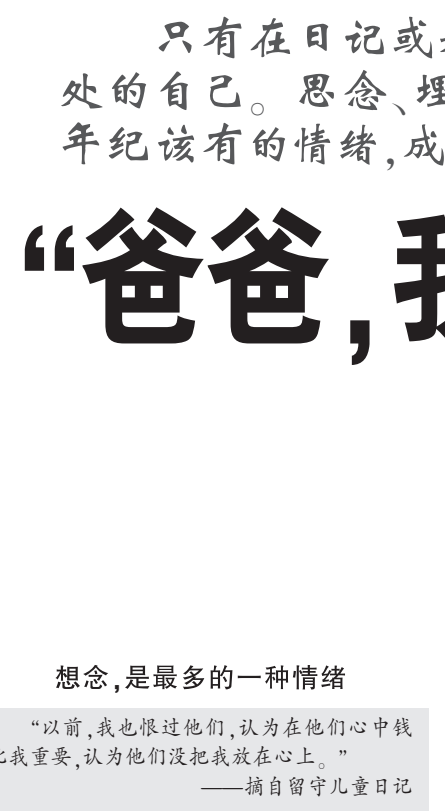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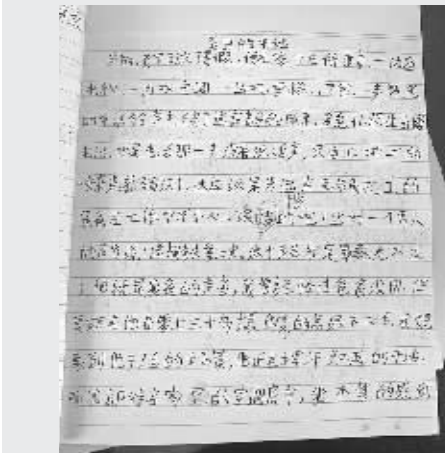
“只要你把学习搞好就行。”妈妈回答道。“我一定会好好学习。”胡升赶紧向妈妈表态。但是当天晚上,依然和上次一样,妈妈趁着胡升和妹妹睡觉的时候走了。

父母会在他们睡着时离开,几乎成了孩子们最熟悉的“套路”。

郑留梅的爸爸打工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江苏、安徽一带的各大城市。每次回家,总是呆不了几天就要去下一个地方。“爸爸知道我舍不得,每次总是在凌晨时分偷偷地走。其实我都醒着,只是装作睡觉的样子在被子里偷偷地哭。”留梅告诉记者。

对留守儿童来说,短暂的相见也就意味着离别。张庆国的爸爸妈妈以28岁的哥哥都在无锡一家鞋厂做工,一般都是过年才会回来。去年暑假时,庆国父母把他接到无锡,一家人短暂地团圆了。

“其实我都不太想去。”庆国说,“暑假就两个月时间,回来的时候更伤心。”



“以前,我也恨过他们,认为在他们心中钱比我重要,认为他们没把我放在心上。”

——摘自留守儿童日记

七年级(1)班的女生大多扎着马尾辫,这让留着齐耳短发的张雨彤格外显眼。雨彤说话时也带着一股酷劲儿,声音清亮。老师张庆敏告诉记者,雨彤胆子很大,喜欢唱歌,每次参加文艺活动都特别积极,“今年班里的元旦晚会就是她主持的。”

但是,雨彤妈妈董秋香眼中的女儿,却和老师谈到的,记者见到的雨彤都不一样。“雨彤这孩子不爱说话,她学校里的事,我不主动问,她就不讲。她弟弟就不是这样,话比较多,比较粘我。”

雨彤的弟弟正在上小学四年级。与弟弟不同的是,雨彤刚出生一周,她的父母就去了福建打工,她被托管给了外婆外公,而弟弟一生下来就由妈妈带。父母都不在身边的情况一直持续到雨彤上小学五年级,因为家里老人生病,妈妈才不得不回来照顾整个家。

即便现在已经回到了女儿身边,董秋香也觉得很难和女儿拉近距离,“她不太愿意和家人沟通,和同学的话比较多。”

“你如果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会首先想到和爸爸妈妈说吗?”记者问雨彤。

“不会,我会先和同学说。”雨彤毫不犹豫地告诉记者。

而这种疏离感,在雨彤和依然远在福建的爸爸之间更加明显。

“爸爸是什么样性格的人?”

“不知道。”雨彤思索了一下答道。

“那你爸平常电话里会和你说什么?”

“就是学习、学习呀——你要好好学习,你弟也要好好学习。”雨彤熟练地模仿着爸爸说过的话。每个星期,她都被要求打电话向爸爸汇报自己和弟弟的学习情况。

但在雨彤的日记里,对于父母的依恋却比她平时表现出来的要深:“我多想让他们多陪陪我,多跟我谈谈心,我也想和别人一样,生病时有父母的照顾,在受欺负时有父母的保护,遇到困难和失败时有父母的鼓励。”

“你在什么时候会像在日记里写的那样特别想他们?”记者问她。

“就是莫名其妙地就想了。但我觉得在他们心里,钱比我重要。”

“那你有告诉过他们这种想法吗?”

“说了他们就会回来吗?”雨彤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在七年级(1)班,这些留守儿童们的父母如果在省外打工,基本上一年只能回来一次;如果在省内,可以一个月回来一次。无论父母离得是远还是近,想念,都是孩子们在日记里记录下的最多的一种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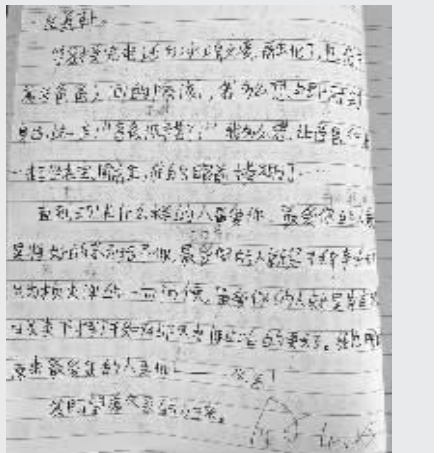
“你们会在什么时候想爸爸妈妈?”记者向孩子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五花八门。

胡升说,他吃饭的时候特别想妈妈,因为妈妈总爱在吃饭的时候唠叨他的学习。妈妈走了以后,“就感觉饭都没味儿了,家里好清静。”

在郑怀玉的心中,每次看到妈妈踏上客车的那一刻,想念的情绪最为浓烈。

“‘怀玉,我走了。’又是这句话。望着她迈上大客车远去的身影,哎,我懊悔没多说一句话,没多看她一眼。”怀玉在日记里,描述了一次妈妈离开时的情景。

在他9岁时,怀玉的妈妈为了帮家里还债外出务工,目前在合肥高新区的一家电子厂做工。“在家时一个月最多只能赚2000元,但在这边一个月能有3500



只有在日记或老师布置的周记中,他们才会解锁内心深处的自己。思念、埋怨、不解、心疼、疏远……种种本不是这个年纪该有的情绪,成了孩子们身上不可触碰的“痛点”——

“爸爸,我好想好想你……”——留守儿童思亲日记

元,还管吃住。”怀玉妈妈对现在的报酬还算满意。

怀玉的爸爸虽然在家,但要忙农活,平时也无暇照顾他,只能把怀玉送到学校去住宿。“他必须学会自己管自己,家里情况摆在这儿,没办法。”怀玉妈妈讲道,“爸爸我好想好想你,你什么时候可以不用那么忙,我可以倚在你怀里撒欢呢?”丁芳在日记里写下了对爸爸的思念。

因为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丁芳上初中以前都是住在奶奶家,直到念初中时,才被父母接回了自家。这个家对于丁芳来说,曾经有一种陌生感。“感觉大家都对我很好,但我还是觉得爸爸最了解我,所以我更依赖他。”丁芳说。

去年,丁芳爸爸去了外地的建筑工地打工。丁芳一旦有了烦心事,只能通过电话向爸爸倾诉,“一般都是我打电话给他,因为他在工地上,没事不会给我们打电话,怕我们担心。”丁芳告诉记者。

今年清明节时,爸爸回家了,给丁芳带了她爱吃的苹果、香蕉,还有一些她之前没吃过的糖果。但一直到现在,那些糖她都没舍得吃完。



“好好学习,将来找个好点的工作”,背负着父母的期望,大部分孩子都很用功。 本报记者曲欣悦摄

“孩子不好管,讲道理又生怕说重了,出什么问题”

“爸爸付出的所有的爱我都知道和明白,但我们不善于去表达内心对对方的关爱。”

——摘自留守儿童日记

“爸爸妈妈会在电话里跟你们聊什么?”记者问七(1)班的留守孩子们。

“学习。”几乎所有孩子都会提到,父母最关心他们的成绩。

李晶晶的爸爸妈妈远在深圳一家手机零件厂做工,妈妈每次在电话里都会和她反复说,在家里要好好念书,不要辜负她的辛苦。晶晶的自尊心特别强,每次考不好,她都会在日记里写,感觉对不起爸爸妈妈,对不起各爷奶奶。

杨雪艳曾经去过爸爸在江苏常州工作的车间:“爸爸在那边很辛苦,基本上一天下来,精神就垮了,一回来就躺在床上躺着。”雪艳十分心疼。但爸爸却告诉她:“你知道我们干这行有多累,多脏,那以后就更要好好努力学习,找个好工作,不要像我们这么累,这么脏。”

郑怀玉经常能考到班级第一名,即便这样,怀玉妈妈打来的电话里,提到最多的也是他的学习,“上次月考,我考了年级第三,打电话告诉妈妈,她很开心,在电话里都笑了。”怀玉说,只要能考进年级前十,就能被保送上全县最好的高中——寿县一中,这也是妈妈的心愿。

七(1)班的语文老师张庆敏在刘岗中学教了12年书。她告诉记者,在刘岗镇,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会考虑把孩子送到县城里或者周边的私立学校念书。“这几年,孩子们的父母在外务工赚到了钱,都会尽量把孩子往外送,现在学校招生越来越难了。”刘岗中学的学生数量已经从最多时的1000多人,锐减到只剩200多人。

其实,刘岗中学的硬件设施并不差。针对学校留守儿童孩子多的特点,有关部门也作了部署。

安徽省在2010年就提出,要用3年时间,整合利用乡镇(街道)、村(居)委会文化室、寄宿学校等现有资源,在全省1308个乡镇创办留守儿童活动室。

寿县也在《留守儿童之家建设实施方案》中对留守儿童之家的建设提出了十分细致的要求,比如面积不得小于20平方米、需配备针线包、小剪刀、小药箱等简单应急生活用品。方案还提到,各项目学校每

2017年5月26日 星期五
 http://www.workercn.cn

学期要对父母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进行摸底,建立留守儿童成长记录档案。

刘岗中学的校长张永凤表示,针对留守儿童生活需要的硬件设备,学校基本都能满足:“书籍、活动场所都会提供,尽量让孩子们在学校里不要有孤独感。但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孩子的心理问题。有时,他们心里在想什么真的不好察觉。”

从教近30年的张庆敏老师对此深有感触:“现在的孩子不好管。一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不自信,又不善于与人沟通。我们做老师的,只能找他们谈谈心、讲道理。讲道理又生怕说重了,出什么问题。”

张老师带过一个班,就曾经发生过有同学在上课时拿小刀割手腕的极端事件。“那个孩子是一名留守儿童,从小父母把她交给爷爷奶奶,她很没有安全感,在日记里也经常写自己心情不好。”

“但有些孩子的父母离得远,他们对孩子的关心只停留在关心考多少分上。”张老师说,隔代教育、放养教育,都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尤其是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他们心理更敏感、情绪波动更大。



老师毕竟不是父母,老师对孩子再关心,也不如父母的家教效果好。

“父母双方在外打工,哪怕有一丝可能都要把孩子带在身边”

“每当傍晚的时候,我都会祈祷:如果明天早晨起来第一眼看到的人是爸爸,那么我是所有代价都愿付出的。”

——摘自留守儿童日记

在距离刘岗镇约100公里的陈集镇陈集乡,有一所更为知名的留守儿童学校——肥东县陈集镇阳光小学。因为5年前媒体的集中报道,校长陈万霞和她的阳光小学在肥东县几乎家喻户晓。

说到这所学校,陈万霞更多的是无奈:“我一直不赞成小学寄宿制。我什么时候都主张:父母双方在外打工,哪怕有一丝可能都要把孩子带在身边。”

其实,经济条件已不是留守儿童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张永凤就告诉记者,“现在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免学杂费。一些比较贫困的寄宿生,一学期还可以领到625元的生活补助。”

“孩子们最缺少的还是亲情陪伴。”张永凤讲道。但在记者采访中,几乎所有父母都会摆出他们的现实困境,讲道自己的情非得已。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鸾直言不讳地指出,有些留守孩子的父母以挣钱为由,没有把对孩子的陪伴和教育放在第一位,这是一种极其短视的行为。他认为,孩子的教育耽误不得,耽误一时,很可能是耽误一辈子。

在国务院去年出台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中,要求外出务工人员要尽量携带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或父母一方留家照料。

“现在最重要的是强制父母跟子女共同生活。”夏学鸾教授指出,“亲情缺失是留守儿童产生的根源,留守儿童之痛,只能靠亲情来解决。”



试题,还有大部分题目均在《2014年河南省“三支一扶”考试真题》中能够找到原題。

有受访者对记者调侃道,这哪里是借鉴,分明是照搬照抄。事业单位的招聘考试,关系到事业单位人员的素质和水平,也关系到考生公平就业的机会,这就必须要求出题人员设计新的考题,尽量避免原題出现,以检验考生的真实水平。

然而现实是,各地事业单位考试題目“翻来覆去”“东挪西拼”现象越来越多,各教育机构押題水平似乎“越来越高”,鲜明对比之下折射的是出题工作人员的偷懶和不负责任,不愿意在試題命題上花费时间和精力,使得原本“公平公正”的竟爭环境失衡,以至于不少培训机构将押中真題作为卖点。

“现在市、县基本没有独立的命题机构和专业的命题队伍,所以招考试題缺乏必要的专业性。”有关教育人士指出,目前县级人社局部门就有权组织事业单位招聘工作。而招考工作的组织层次太低,交给或者委托社会上的其他机构、单位或者人员成为现实选择,这使得事业单位招考試題的命题工作处于不可控状态。